

# 刚恒毅与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顾卫民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1922年, 罗马教会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 落实教廷《夫至大》通谕, 并于1924年召开第一届教务会议。此次会议的重点是培植本地籍神职人员, 并将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脱钩, 建立一个正常的和本地化的教会。

**关键词:** 天主教; 刚恒毅; 天主教会本地化

**中图分类号:** K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05)03-0050-06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天主教会, 承袭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遗留下的沉重负担, 同时面临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冲击, 而其内部中西教会人士要求本地化的呼声日益增高, 这种改革的要求终于引起天主教会中枢罗马教廷的关注。为落实《夫至大》通谕, 教廷于1922年派遣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 在以后的10年之中, 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在艰难曲折中有了一定的推进。

## 一、《夫至大》通谕的发表及刚恒毅来华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和情势。其一, 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 天主教会遭受沉重的打击, 共有5位主教、31位欧洲传教士、9位修女被杀, 中国教徒死亡者逾3万人。<sup>[1]</sup>但是, 在“庚子事变”后的10年中, 中国天主教徒的人数却有了大幅增长。1900年教徒人数为74万余人, 1910年, 全国教徒人数为136万余人, 到1921年, 即刚恒毅来华前一年, 有教徒256万余人。<sup>[2]</sup>其二, 信徒的人数虽有明显的增长, 但是主要集中在农村, 其来源也主要是农村穷人和村妇, 知识分子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礼仪之争”以后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对教会的疏离。其三, 法国在中国拥有保教权, 它声称所谓的法理基础是1844年的《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 尤其1860年的《北京条约》第三款, 故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处在法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庇护下及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之内。在1885年, 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想借蚕池口教堂迁移一案与罗马教廷直接通使, 以摆脱法国的保教权, 但被法国强行阻止。1918年7月, 罗马教廷曾拟派白赖里(Abp. Petrelli)总主教为宗座使节出使中国,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拟派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为驻教廷使节, 但是再度被法国强行阻止。<sup>[3]</sup>由法国代管中国天主教, 既是一种不伦不类, 也是造成无数次民族冲突的根源。其四, 当时来华的外籍教士, 有属同一国籍却不同修会, 也有同一修会但属不同国籍, 有的则国籍同修会同但会不同, 各修会独立运作, 财政不贯通, 人员不往来, 各自划地为牢。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 比之天主教“至公合一”的理想, 不啻是一种讽刺。<sup>[4]</sup>

20世纪初年,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潮流腾涌四泻, 1905年以后的立宪和新政、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3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及1926年的北伐战争, 将中国带入一个动荡而又不安的新时代。中国天主教会身处其间, 其当局又持拒不改革的顽固态度, 再加以不平等条约的庇护, 很容

易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首先对此情况表示忧愤的是中国教会内的富于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创办《大公报》、《益世报》而得时名的英敛之于1916年作《劝学罪言》，他最感不平的是同为天主子民，外籍教士可以说爱国，中国教友却不能说爱国，“岂圣教道理，独于中国教民，当使之爱外国乎？”<sup>[5]</sup>马相伯则将笔锋直指当时教内的中外传教士学问低下，“西国教士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中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较前更低，圣教历史且不讲求，科学更无论矣”。<sup>[6]</sup>在西方传教士中，雷鸣远、汤作霖亦有相同之感受，这种要求变革的呼声终于上呈到教廷的面前。

1919年11月，罗马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 1914—1922)向全世界天主教会发布了一个通谕，由于其行文以“夫至大至圣之任务”为起首，故称《夫至大》通谕(Maximum illud)。它要求传教士尽量与本地的文化和社会相融合，在外方传道的西教士应尽量培植本地神职人员，发挥他们在教会事务中的作用。通谕认为，一个在异国为天主传播福音的人应当置父母之邦的利益和光荣于教会之下，不要介入列强的政治：“假如见到传教之士，竟忘却本身位分，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之权威出乎中道之外而伸张之，母国之光荣重于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实为宗徒用功极猛之疫症。”<sup>[7]</sup>教宗在通谕中提到了两名传教士，即拉斯·萨斯(Las. Casas)和沙勿略(Francis Xavier)，前者为多明我会派往美洲的会士，专以捍卫困苦无告的印地安土著为己任，后者是来亚洲的开教之祖，鼓吹以文化传教，创立了印度、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基业。教宗在通谕中号召全世界的传教士追随他们的榜样，将天主教扎根于本地社会之中。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的使命即为落实和贯彻《夫至大》通谕的精神。

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意大利人。生于乌地纳，早年随父亲习泥水工，有艺术天赋，16岁入修道院，1897年9月在罗马大学肄业，1899年12月23日晋铎。1901年3月任公高蒂亚总本堂神父，1915年任亚奎利亚(Aquileia)代理总本堂。1917年10月至罗马任战地医院服务司铎，1918年12月，任公高地亚副主教，创立战时弃婴医院，收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孤儿。1920年4月，任斐乌墨(Fiume)团理主教。1921年，教宗本笃十五世升其为正式主教。<sup>[8]</sup>

1922年6月12日，刚恒毅被告知将被新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为驻华宗座代表(Delegatus Apostolicus)。刚恒毅研究了近年有关中国教务的文件，包括1919年光若瀚巡回使的调查报告，并结合《夫至大》通谕的精神，将其使命归纳为下列五个方面：(1)宗座代表的使命为纯宗教性质，不带政治色彩；(2)尊重中国政府，绝不为外国利益服务，宗座代表只代表教宗；(3)教廷不干涉政治，有时政治走进宗教的范围，教宗偶然亦办政治；(4)教廷在中国不应谋求帝国主义式的利益，中国应该是属于中国人的；(5)天主教是普世的宗教，主教的人选应从当地的中国人中选出，外籍教士在结束开辟教区、培训神职的任务之后，应退到别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新的本地教会。<sup>[9](P84)</sup>

## 二、刚恒毅对中国教会本地化的思考

刚恒毅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了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详细了解了1840年后历次中外战争的经过，以及由这些屈辱的战争所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他既看到了中西交往中中国人“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不了解西方的进步”的一面，也看到了西方人“在中国常以主人自居，他们有自己的法庭，不受中国人的审判，他们掌握关税，这是财源的大部分，还驻有军队”的另一面。而在20世纪初年，前一面已趋淡化，后一面却变得显赫而且醒目。刚恒毅认为传教事业不应以强权为后盾，这违背了早期教会的使徒们以德行传教的精神，只有这种爱的精神才会产生信仰的感召力。而19世纪以后的整个传教路线，正与此背道而驰。教会与殖民主义势力结合，“或许会给某个传教行动个案上带来优势，但是给整体上带来莫大的伤害”。因此，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回到使徒式的传统。在刚恒毅看来，天主选择的使徒们，都是社会地位卑下的人，他们没有金钱和强权可以依凭，完全是靠着信仰和爱德去执行天主的命令。刚恒毅对于使徒式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的思考，就是要把传教区的权力真正地交给本地籍的神职人员。刚恒毅对于《夫至大》通谕的精神作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概括，那就是：“殖民主义，请退位，必须将传教区让与地方教会。本籍神职人员已经到了成长的年龄，监护人应当退位了。”<sup>[9](P87)</sup>“传教士应该牢记，他们在中国是客人而不是主人”。<sup>[10](P41)</sup>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刚恒毅着手并推进一些改革的工作，这些工作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向：1. 开始将教会与

万方数据

保教权脱钩；2. 提升中国籍神职人员在教会里的地位；3. 提倡以文化传教的方法，注重天主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调和与融合。

### 三、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在 19 世纪发生的诸多教案中，赔款问题一直是民族冲突和中西冲突的焦点，凡遇教案、教会领袖或神职人员往往求助于在华的列强殖民当局，然后由列强的外交人员直接与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吏折冲，最后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刚恒毅对这种情况深表反感。关于在教案中，中国政府向教会的赔款问题，刚恒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法国保教权的看法。他认为，索要赔款，尤其是政治性赔款是不符合天主教精神的，他将这一反赔偿的问题，反映到罗马教廷后，教廷公布原则，以便在中国的天主教各教区来遵守，其内容如下：1. 凡传教士被杀害，不得要求赔偿，为死难的血而要求金钱赔偿，与天主教会之精神背道而驰。2. 若请求补偿教区物质之损失，应注意以下三点：(1) 受害的教区要求补偿，须先经教区权力人同意。(2) 必须向实际负责人请求，若为民事伤害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除非因某些因素的存在。(3) 以所损失之限度内。3. 有关向中国官员直接谈判事宜，若宗座代牧或监牧向省政府办理，应尽可能避免外国政府的牵入。若向中央政府交涉得由宗座代表办理。4. 该地区若需要请求补偿时，应有一定限度和爱德，这样符合由天主接收博爱、和平之传教任务，于教外人中宣传福音而牺牲生命。以往以列强之武力所逼之赔款遗留下的深痛血痕，危害教会非浅。5. 若被害传教士亲属，藉领事及其外交官向中国政府要求适当赔偿，圣座不参与这项交涉。<sup>[9](P149)</sup>

作为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天主教的远播，但对在华天主教会来说，又意味着对法国保教权的否定以及建立本地化的教会组织。天主教自元代入华以来，从未有召开过全国性的主教或教务会议。刚恒毅来华以后，即有此想法。1923 年 3 月 19 日，刚恒毅在汉口向全国代牧发出一份牧函，其要点：1. 把握时机，充分利用已享有的宗教自由；2. 关注转折中的中国，可能出现一个对基督教友善或敌对的新中国；3. 抵御西方物质主义入侵，迫切需要办更好的学校，教育青年。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刚恒毅在汉口召开了一次为次年全国主教会议作准备的预备会议。他召集了五大传教区里各国籍、各修会神长 23 位，其中华籍 7 名，共同筹备，刚氏自任主席。此次第二次预备会议分为 7 个部，每部 3 人，都来自不同教区。每部负责整理各自的讨论材料。详细讨论后再将各部的议案汇集在一起，同时将以前历代教务会议的议案汇集参考。会议主要讨论教会的前途和困难，对于中国新文化思潮以及国民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动等对教会有较大影响的问题也纳入了讨论的议题，并以天主教的法律和传信部最新的规定加以框定。此次会议的宗旨是将所有应该讨论的问题都写成议案系统整理。有秩序地提交明年的全国主教会议讨论。（见罗马 13 传信大学中国学生会编：《刚总主教到华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54—55 页。）

1925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2 日，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全国主教会议，教廷将此会议定名为“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出席大会者有 42 位主教、4 位监牧（内两位中国籍）、1 位监理、36 位参议司铎（内一半为中国籍）。宗座代表刚恒毅任大会议长，其次为主教监牧，他们在会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还有投票权；其次是修会的省会长及会长，他们处于顾问的地位，无投票权。其他与会的职员还有动议员、秘书员、证案员和顾问，他们在精神上与会议有密切的联系。（参加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的主教暨监牧名单见《圣教杂志》13 年 7 期（1924 年天主教主教公会会议专号“Primum Concilium Sinense”相关章节，1941 年上海徐家汇版）。

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的主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它第一次以教会的名义公开申明“决不可让头脑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耀于大众之前”。为了使这次大会显示合一的色彩，参加会议的主教和代表虽公属各国，但只准使用教会共通的语言——拉丁文。各国公使和领事亦未获邀请参加会议。

此次全国教务会议作了一些极重要的决定：

1. 教堂内不得悬挂外国国旗和国徽；在此以前许多教堂为寻求法国或其本国庇护，经常悬挂法国国旗；

2. 教省的划分应依中国国内行政区划而定,并以主教公署所在城市命名;
3. “传教士是由其所属修会的宗座直接或间接派遣的司铎,为向非教友宣讲基督的信仰,并为此在传教区的监牧或代牧或修会会长的领导之下,建立起奉教者的信德”。此条完全是为了告诫传教士只有教会而非其母国是其真正的长上;
4. 教友、传教士和本地司铎,均应遵守中国一切公义法律,不应以说话和文字来违反中国的法律和礼俗;同时也应尊重其他国家保护教友的法律;
5. 中国籍司铎享有与其他传教士一样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籍司铎只要有资格,不应禁止他们担任教会的职位;
6. 各教区应该设立一个议会,由3位年资较长的精明传教士组成,至少其中一位是中国籍;
7. 修会长上首先应维持修会纪律,应有一个由会士组成的议会;
8. 由传教经验及圣座指示的最佳传教方法包括:宣讲天主圣言、培植本地教会和神职班,鼓励本地教友劝化他人、促进与华人关系、设立高中和学校从事写作和散发护教书刊,举办慈善事业等等;
9. 所有传教士应能听懂中文,新到的传教士应至少一年作全职的语言训练,并与资深传教士共事一年;
10. 有关买卖的事宜,只有在实有需要,而且在设尽各种办法仍无避免时,才可诉诸外国权威(外国政府代表);但是传教士绝对不可在求得主教同意之前,自行诉诸外国权威。切不要为了少许利益,而激起人们对教会的仇视;
11. 传教士不干涉教友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除非先问准主教或其署理主教;
12. 神职人员无宗座特许不得行医,但传教士可施赠金鸡纳霜;
13. 尽快废除自19世纪以来中国教会中流行的教徒向教长行的叩头礼;
14. 修女的主要任务是照顾病人,尤其是教育孩子、妇女和主妇等等。(见“Primum Concilium Sinense”相关章节,1941年徐家汇版。又见“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Anno 1924, Acta—Decreta et Normae—vota, etc”,1929年徐家汇版)

此次全国主教会议对文化工作予以相当的重视,该会议宣布须注重如下方面的工作:

1. 成立《圣经》翻译委员会。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如贺清泰,早在清初时期即已译介了一部分《圣经》。由于“礼仪之争”及其他的原因,《圣经》翻译的工作长期被搁置。倒是1807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参考天主教译经的基础上,完成了《圣经》的全部翻译。现在,天主教应该迎头赶上;
2. 编辑一部供全国使用的统一的教理问答;以前各修会或教区有各自的教理问答,各有差异,这是教会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情况的反映,现在应该结束;
3. 成立一个机构,以便在学校、印刷、公教进行与送青年出国留学等问题上协助宗座代表。为应因这一要求,1928年初终于成立“印刷与学校委员会”,由山东兖州韩宁镐主教任召集人。全国教务会议指出天主教会在文化工作方面的努力方向是:(1)在天主教学校里,为男女学生开设宗教的、伦理的、国学的和科学的课程;(2)促进天主教学校间的合作与互助;(3)在适当时期负责出版有关课程方面的专用书籍,正如办得十分成功的法文《中国教学课程》(L'ecole en Chine)一样;
4. 认真编辑出版适用于各级学校的教材;
5. 出版及推广无政治色彩的书籍与定期刊物,供一般人与知识分子研习天主教;
6. 应协助书籍与刊物的出版与推广,特别关心天主教的出版社和书局;
7. 遣送青年出国留学等等。以上措施均可看成是教会重视文化工作的表征。<sup>[9](P201-202)</sup>

#### 四、培植中国籍神职人员

此后,由刚恒毅发议,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他先从北京教区中划出一区,成立新的宣化教区,从太原教区中划出汾阳教区,从宁波教区中划出台州教区,从南京教区中划出海门教区。<sup>[11]</sup>随着各新区的成立,4位中国神父被任命为主教,2名中国监牧升任为正式主教。他们是:

1. 宣化教区赵怀义主教, 圣名雅各伯。1880年10月4日生于北京西面十五里长辛店的一个小村庄正福寺。他的父亲死于“庚子事变”之中, 他的两个兄弟都是神父, 一个在杨家坪苦修院, 已经去世; 另一位则是北京小修院的教授。赵怀义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友, 双目失明。赵氏本人于1893年11月7日入北京北堂小修院。1904年2月27日晋铎, 以后四年任北京初学院教授, 以后又在宣化教区和北京教区服务, 并任毓英中学校长。刚恒毅来华以后, 于1923年1月8日出任宗座代表秘书。1926年5月10日被任命为直隶宣化教区代牧。当时该教区有10个县, 人口100万, 有2万7千余名教徒, 16位神父。

2. 孙德桢主教。圣名默尔爵。1869年11月19日生于北京, 早年在北京修院中学习。1897年2月24日晋铎, 两年以后于1899年2月24日成为一名遣使会士, 他的另一位兄弟也是神父。孙氏长于拉丁文, 1901年以后, 他在北京北堂小修院讲授拉丁文达12年之久, 又在北京六里外的牛房传教。1924年4月15日, 他被任命为直隶蠡县宗座监牧。他参加了1924年上海的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 1926年1月被任命为主教。他的教区有六个县, 人口75万, 信徒2万6千余人, 神父15名, 教堂和小教堂149座。

3. 成和德主教, 圣名奥多利各。1873年7月22日生于湖北老河口, 早年在湖北谷城的茶园沟修院学习, 10岁时他去了意大利并很好地掌握了意大利语, 1894年8月7日, 他在意大利拉维那山(Mont. la Verna)加入方济各会。1900年6月15日, 他在学完了神哲学以后晋铎。1903年1月回到中国, 以后4年, 他一直做传教工作, 又任茶园沟修院副院长, 又去湖广总修院教授哲学。1924年3月2日, 他被任命为第一名中国籍的宗座监牧, 管辖蒲圻教区, 他也参加了1924年上海第一届教务会议。1926年6月1日升任代牧主教。他的教区有4个县, 人口120万, 天主教徒仅1千八百余名, 有神父9人, 教堂36座。

4. 陈国砥主教, 圣名阿洛苏斯, 1875年11月7日生于山西潞安村, 他的另一个兄弟也是神父。他于1896年10月4日于洞儿沟加入方济各会; 于1903年3月13日晋铎。“庚子事变”以后, 曾被委派调查山西教案事宜, 以后又任两位意大利主教的中文秘书。他在山西太原修院教授拉丁文和护教学。1911年任太原主教座堂本堂, 1921年任临县总铎区总本堂。1926年5月10日升任山西汾阳教区守座代牧。他的教区有10个县, 160万人口, 1万余名天主教徒, 15名神父, 88座教堂。

5. 胡若山主教, 圣名若瑟。1881年2月2日生于浙江定海, 祖先12代均为天主教徒, 5岁时成为孤儿, 由传教士抚养长大, 早在定海、宁波、嘉兴求学, 1906年11月6日成为遣使会士, 1909年6月5日晋铎。以后6年中一直从事传教工作, 后在宁波大修院中教授哲学。他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教务会议。1926年7月30日他被任命为浙江台州宗座代牧。他教区包括5个县, 人口269万余, 有天主教徒5千名, 神父6名, 教堂40座。

6. 朱开敏主教, 圣名西满。1868年10月30日生于上海, 他出身上海一个老天主教家庭, 有300多年的奉教历史。1882年9月8日, 他进入修院。1888年9月7日, 他加入了耶稣会, 由著名汉学家晁德莅指导学习, 1898年6月28日晋铎。以后多年他一直从事传教工作, 1924年他被派为海门和崇门教区的长上。1926年8月2日, 他被委任为海门教区宗座代牧。他的教区包括6个县, 人口500多万, 有天主教徒3万2千余人, 神父19名, 教堂156座。

1926年9月, 刚恒毅偕同朱开敏、胡若山、赵怀义、孙德桢、陈国砥、成和德启程赴罗马参加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主持的祝圣大典。他们一行乘美国邮轮“亚当斯总统号”于9月10日离开上海, 沿途于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科伦坡都受到热烈欢迎。10月16日抵意大利那波里, 受到意大利政府和教会的欢迎, 在罗马更是受到盛大欢迎。抵达次日, 即受到教宗的接见。10月28日, 祝圣大典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有16位枢机主教, 无数位主教、修会首长、外交使团、贵族, 从巴黎大学、鲁汶大学和欧洲其他城市来的中国留学生共4万人参加典礼。对此清代初年, 罗马教廷公布了对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的任命以后, 不少外籍主教竟以中国人不胜此职而不愿为之祝圣。1926年, 这6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的声光动人确乎表现了中国天主教今昔之不同。

据中国天主教历史学家徐宗泽神父在《圣教杂志》1935年第8期上的一篇文章《近十年来天主教在我国之状况》一文中的统计, 由中国籍主教管辖的教区已达23个, 虽然中国籍主教区在全国一百十几个教区中只占五分之一弱, 但对比1922年刚恒毅来华之前无一中国籍主教区的情况, 显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在

同一时期,中国籍的神父和修女也是相应地增加。鸦片战争时期全国天主教神父共约 130 人,1900 年增至 470 人,从 1920 年起几乎增加了一倍,达 963 人。经过有意识的培训和提拔,到 1930 年中国籍神父已达 1500 人,1933 年达 1600 人,与此相应增加的中国籍修女到 1933 年达 3600 人。<sup>[12]</sup>在缓慢的本地化进程中,天主教会的修院和国籍神职班也有所增加。(见罗光:《刚总主教与传信部大学的中国修生》,《刚总主教到华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1928 年,刚恒毅创设了第一个由中国籍神职自行管理的修会——“主徒会”。此事由刚氏委托宣化主教赵怀义办理,但赵在 1927 年去世。1928 年,程有猷主教继任,在宣化城外购得背山面河、清静远俗之地百亩,大兴土木,同年秋,“主徒会”正式成立。创建初期,由西班牙教世主会协办,待基础稳固以后将完全由中国人管理。根据刚恒毅的思想,主徒会应具有如下特点:1. 促使公教思潮,使中国文化基督化,要注重教育及文化事业,鼓励会士研究学术著作,注重与儒家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文艺美术的沟通与调和;2. 要在未开辟传教区的地方以及缺乏本国籍神职人员的地方注重传教工作;3. 服务于海外的民众;4. 服务于贫穷困顿的民众。主徒会徽为金属圆形式样,上刻有圣彼得大堂及一荷花围着的圣体。<sup>[13]</sup>

尽管如此,20 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仍然是比较缓慢的,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本地教会的标准。相当多的外籍教会人士对改革抱有抵触情绪。然而,这个过程毕竟减弱了天主教会在 19 世纪所特有的过分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而增多了宗教本身应有的肃穆和感化力。后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从另一个方面打断了这个进程,使有志于教会本地化的人们所预想的境界无法实现。

#### 参考文献:

- [1] k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M].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512.
- [2] 德礼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M].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93-94.
- [3] 乔凡诺里. 本笃十五世任教宗时期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J]. 近代中国,1996,(6):11.
- [4] 罗光. 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A]. 罗光. 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C]. 台南:光启出版社,1976. 305.
- [5] 马相伯. 马相伯文集续编[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80.
- [6] 英敛之. 劝学罪言[A].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C]. 北京:中华书局,1981. 309-310.
- [7] 教宗本笃十五世. 教宗本笃十五世通谕译文[A]. 朱维铮. 马相伯集[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18-340.
- [8] 刚恒毅. 残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M]. 台南:主徒会出版,1980.
- [9] 刚恒毅. 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M]. 台南:主徒会出版,1982.
- [10] 刚恒毅. 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M]. 台南:主徒会出版,1982.
- [11] 赵庆源. 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Z]. 台湾:闻道出版社,1980. 79-82.
- [12]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15.
- [13] 夏清颖. 刚总主教与国产主徒修会[A]. 刚恒毅枢机使华七十周年论文集[C]. 台湾:主徒会出版,1991. 41-56.

## Gang Heng-yi and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Chines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1924

GU Wei-m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In 1922, Gang Heng-yi, a senior representative from Roman Catholic Church, came to China for the imperial decree Fuzhida and held, in 1924,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Chines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 conference mainly discussed how to train local clergymen so that the missionary work could be separated from powerful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at a normal, indigenized Catholic Church could be setting up.

**Key words:** Catholicism; Gang Heng-yi; indigenization of Catholic Church

(责任编辑:周成璐)

# 刚恒毅与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作者: [顾卫民](#), [GU Wei-min](#)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刊名: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12(3)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3条)

1. [kneht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1966
2. [德礼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1980
3. [乔凡诺里 本笃十五世任教宗时期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1996(06)
4. [罗光 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 1976
5. [马相伯 马相伯文集续编](#) 1974
6. [英敛之 劝学罪言](#) 1981
7. [教宗本笃十五世 教宗本笃十五世通谕译文](#) 1996
8. [刚恒毅 残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 1980
9. [刚恒毅 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 1982
10. [刚恒毅 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 1982
11. [赵庆源 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 1980
12.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1981
13. [夏清颖 刚总主教与国产主徒修会](#) 199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dxxb-shkxb200503008.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dxxb-shkxb20050300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f12b6717-73db-4499-b2b9-9e4d00811b5c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